



转型中的社会： 奈保尔作品研究

Naipaul's Modernizing Societies

杜维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转型中的社会： 奈保尔作品研究

Naipaul's Modernizing Societies



杜维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社会:奈保尔作品研究/杜维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10598-4

I. ①转… II. ①杜… III. ①奈保尔, V. S. (1932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054 号

责任编辑 马 博 马爱农

装帧设计 吴 慧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9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 2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98-4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2年3月

序 言(一)

杜维平的新书《转型中的社会：奈保尔作品研究》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继续深入研究，对原文做了较大改动后写成的。从奈保尔 200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国内研究奈保尔的专著已经有近十种。与这些专著相比，这本书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一、选题新颖。几十年来，国外对奈保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描写究竟是否客观这一焦点问题和他作品中关于流亡的主题；而国内的奈保尔研究多是对国外研究的重复。依据后殖民理论研究他作品中的殖民主义主题的人扎堆，而立意新颖的选题并不多见。该书在选题上尝试研究奈保尔涉及转型中的社会的那些代表性作品，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上。这一选题国内外目前尚未见有人触及。

二、现实关联性较强。该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奈保尔小说和非小说文本中四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特立尼达、印度、非洲国家和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集中关注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读这本书时，我一直能感到杜维平对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关注。他不只是在研究奈保尔笔下的特立尼达、印度和非洲，而是同时在对当下中国进行考察。这本书的现实关联性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来解读评论外国文学作品，并建构中国学界自己的学术话语，正是国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责任和使命。

三、研究路径新。国内外的奈保尔研究专著一般都是按照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对其进行研究。这本书则是依循奈保尔创作版图，把他涉及转型中的社会的作品根据其所属的社会分成特立尼达、印度、非洲和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这四个板块进行研究，进而考察这些社会分别所属的文明以及文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采用这样的技术路径，该书很好地把握、梳理了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问题成因的内因、外因和共性，

并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

四、注重文本细节。近些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流行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但是,不少研究者对文本下的功夫不大,甚至有时为了得出预设的结论,故意忽略文本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和内容,只选用能支撑自己采用的理论的细节,因而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杜维平对奈保尔小说和非小说文本的研究反映出他对文本的熟悉和关注。正是在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不盲从或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才有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其实,文学研究的基础正是对细节的关怀,离开对文本的细读,再宏大高深的理论都只不过是沙地上搭建的高塔而已。

张中载

序 言(二)

V. S. 奈保尔的作品,很多已在我国翻译出版了,最近还看到他的近作《非洲的假面剧》(2010)的译本(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自从这位印度裔英国作家在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国不少比较年轻的外国文学学者将他作为研究对象,杜维平是其中之一。

奈保尔在英国生活了六十多年,但是他小说和游记类著作往往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背景。诺贝尔奖评委会称赞他“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诚实的细致观察融为一体”,指的就是这类作品的基本品质。“诚实的”一词原文是“incorruptible”,直译是“不可腐蚀的”,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俗见所败坏的”。至于何为“俗见”,那就只可意会了。奈保尔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和民族允许自己被剥削和摧残?它们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允许这一切发生?它们的弱点是什么?人们会发现,它们的弱点依然存在,这些弱点可能来自内部,来自某些民族的局限性,它们文明或文化的局限性。”在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相对主义较为流行的年代,这样的提问方式称得上“反潮流”了,甚至是应该回避、禁止的。杜维平在本书“总论”引用了这段话,却没有拎出来示众批判的意思,书中有几个章节还以《河湾》等小说为例进一步展开了这一话题。也许这问答之中就蕴含着奈保尔特有的诚实吧。我倒是希望中国读者能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改变一下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比如,我们在谴责鸦片战争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有效管理鸦片?为什么有的民族能自觉抵制鸦片的诱惑?提出这些问题,绝无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脱罪责之意。

不断有人说,奈保尔是帝国殖民政策的辩护人,这样的批评并不错,但是也不尽然,如他的《黄金国的失落》(1969年,尚未译出)就揭示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特立尼达殖民过程中的贪婪和残忍。以指责奈保尔为满足,并不见得就有益于自己的社会治理和国力的提升。七十多年以前,胡适先生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认清中国与别国的差距。这种勇于自知和改作的精神至

今依然是宝贵的。“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可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但是要真正使一个新兴国家强大,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而且,那些缺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街上喊口号的年轻人并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体系逐渐崩溃,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可惜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缺乏对自己文化和行事方式中显现出来的核心价值的深刻认识,还是无从谈起的。这或许也是奈保尔对有些国家在形式上仿效欧美政治体制、追随“民主”“自由”持怀疑态度的缘由。《埃尔维拉的选举权》(1958)讽刺的是特立尼达乡村选举,虽是小说,却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入门之作。用奈保尔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出生地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社会”。

1968年,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出版了他的《非洲的困境》一书,试图探讨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依然困难重重的深层次原因。这在当时反殖民运动的政治氛围下有点犯忌,因为对大多数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原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是时代的进步,值得庆贺,如果有人悲观地看待非洲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就有怀恋、维护殖民主义之嫌。但是安德烈斯基教授在非洲生活过八年,积有大量地方经验,他对一些非洲现象的描写也以“诚实的细致观察”为特点。他坦率指出,这些国家所缺少的,除了技能,还有与现代化转型适应的习惯,养成习惯,往往比获取技能更加艰难;世界格局下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必须改变,新殖民主义也应抵制,但是很多乱象(如政客的盗贼统治、普遍的腐败行为、脏乱差的环境、一夫多妻制、裙带关系等等)未必可以归罪于昔日的殖民国家。《非洲的困境》是一本让人读了心里沉重的著作,英国的左翼人士不喜欢它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批评归批评,书中揭示的问题并不会自动消失,非洲的难题绝非无私的外援所能解决。坦赞铁路的建设始于1970年,当时正值“文革”,我国不会有人去平心静气地阅读《非洲的困境》。不幸的是安德烈斯基确有远见。如今坦赞铁路设备老化,运行困难,当地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态度也值得检讨。如果他们养成了处处责骂中国人的恶习,那不是可悲吗?

正是奈保尔的非洲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远比《非洲的困境》生动而且让人悲叹的场景。

在杜维平的《转型中的社会》里,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也是关注的重点。奈保尔首次访问印度是在1962年。为了认识他祖先的国度,他在出发前读了甘地的作品,很有感触。甘地曾经留学英国,又在南非生活过,善于

比较不同的文化,不免对印度触目皆是的失治现象感到愤怒。他一再奉劝他的国人不要到处丢弃垃圾,不要在公共场所随意拉撒,很难见效。社会转型其实也是移风易俗的过程,这是一个比建造高楼、铺设铁路难度更大的社会发展过程。甘地从印度普通民众的积习发现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没有公共意识,共同归属感很难产生,于是就大力倡导他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公共精神”“服务精神”。印度独立后经常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诩,奈保尔则认为名号是名号,现实是现实,印度表面上那种民主、自由的制度得不到相应的纪律和社会正义观念的支撑,在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文化习俗中浸泡,变形失效,不具真正的生命活力。奈保尔写道:“自由随着实现自由的机制来到独立的印度,但这是外国的自由,更适合另外的文明;在印度,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信仰和古代限制相隔离。”他失望地注意到,遇到危机,公务员缺少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商人经商以欺诈为特点,凡此种种都在阻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整个社会无非是在象征性的宣传中求得心理满足,摆姿态或说应景话就成了风气。一旦切实的治理为一套象征体系所代替,标签就比实质性的行动更为重要。“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两个广受欢迎的标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十分经典地指出,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统治的形式(或曰政治制度),而是统治的程度。“统治”一词的英文,亨廷顿用的是“government”,该词也有“治理”的意思。我国近来大讲“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说明政府的高层对中国面临的挑战有了新的认识。

不难想象,杜维平在写本书的时候经常难以落笔。他一方面想从奈保尔的第三世界小说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成分,一方面又想对奈保尔的西方中心主义(即他的理想读者为欧美读者)持一种严厉批评的立场。有时他在两者之间犹豫,或许感到它们所形成的张力和矛盾难以解说清楚。因此这本书读下来略有遗憾,作者行文时缺少弹性,仿佛非得给他所评论的观点、现象确定是非。不过我想不管对谁来说,处理这个话题都不容易的。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同年他在纽约作过一次不大明智的演讲,把英国的文明称为“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并说自己能够从帝国的边缘落脚到中心,全赖这“普世文明”之力。^① 杜维平对这次演讲花费了不

① 英国学者弗兰克·克莫德在评论带有自传性质的《抵达之谜》时这样形容奈保尔的“归顺”：“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压迫者古老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与那位压迫者残存的荣光共度余生。”

少笔墨。确实,这样的描述,除了有点俗气,还很难得到英国作家的认可。英国的文明或文化,不是抽象地按照一套所谓的“普世”话语设计出来的,它是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进程的结果,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模仿、照搬。奈保尔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嘲讽起印度或非洲的效颦者来非常刻薄,可为证明。或许,“universal”一词还有一层兼容并包的含义(即给予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与我们的语境中“普世”一词的意思有所差别。我想以后也会有别国青年因“中国梦”到中国来读书,用中文创作出在全世界都受到敬重的文学来。那位成功的作家说中国文明是“普世文明”,我们有何理由拒绝呢?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还真要想一想,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西班牙港所接受的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移人力量。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我们的政界和经济学界也可以知道,对转型期社会最深刻的解剖,实际上来自英语文学。

陆建德

目 录

总 论	1
一 第三世界叙事	1
二 奈保尔的普世文明观	7
三 奈保尔的创作观	18
四 两个关键人物对奈保尔创作的影响	23
五 奈保尔研究综述和本书的研究思路	29
第一篇 特立尼达:寻找中心	33
第一章 《米格尔大街》中的社会批判:从对该作品的后殖民批评谈起	35
第二章 《埃尔维拉的选举权》:一场关于民主的闹剧	53
第三章 毕司沃斯先生的反抗和追求	67
结 语	85
第二篇 印度:从幽黯国度到百万叛变的今天	89
第四章 《幽黯国度》:透过两个自我看印度	91
第五章 《印度:受伤的文明》中的印度文明和现代化	114
第六章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的现代印度巨变	122
结 语	132
第三篇 非洲:没有未来	135
第七章 《在自由的国度》中的自由主题	137
第八章 “非洲是一片丛林”:《河湾》中的现代化主题	151
第九章 《非洲的假面剧》中的宗教与现代化	172
结 语	181
第四篇 伊斯兰国家:信仰的乌托邦	183
第十章 一个反现代化主题:《在信徒的国度》及其前后	185
结 语	216

结 论	218
参考书目	227
附 录 从未抵达吗？——破解《抵达之谜》	240
后 记	253

总 论

一、第三世界叙事

V. S. 奈保尔 (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 是印裔英国小说家,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被许多评论家誉为“当今活着的人中用英语写作最伟大的作家”^①。迄今为止, 奈保尔著有三十部小说和非小说作品。

奈保尔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 他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特立尼达、印度、非洲国家和伊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基斯坦等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所以选择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创作的背景, 是因为对他来说, 相对于英国题材, 第三世界题材更容易驾驭, 并且在他创作之初, 恰逢殖民者从殖民地撤离。他原以为世界格局会发生变化, 但是, 西方国家依然称霸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依然贫穷落后。这促使他不得不思索: “为什么有些国家和民族允许自己被剥削和摧残? 他们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允许这一切发生?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人们会发现, 他们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些弱点并不总是由外部因素、由他人的侵略造成的。这些弱点可能来自内部, 来自某些民族的局限性, 他们文明或者文化的局限性。”^②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奈保尔开始了他的第三世界文本创作, 并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 他一直集中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民性格及其文化或者文明特征。奈保尔并不是孤立地去看这些问题, 而是把它们置放在具体的时空之中来衡量, 看它们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的那些社

① See Linda Blandford, “Man in a Glass Box,” in *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ed. Feroza Jussawalla.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 51.

② Cathleen Medwick, “Lif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V. S. Naipaul,” in *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ed. Feroza Jussawalla.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 60.

会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奈保尔的前四部小说都是以特立尼达为题材。特立尼达这片农业殖民地是文化沙漠,并没有给奈保尔留下什么好印象。他曾经抱怨说:“沙漠里长不出大树。”^①因此,这几部小说里描写的主要人物往往受到自己的生长环境束缚,碌碌无为,个人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同时,这片不毛之地也滋生了这些人物卑劣的性格。

《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 1959) 尽管在出版顺序上排在第三位,但是,却是奈保尔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这是一部由十七个既相对独立、又有统一主题的故事连缀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离开特立尼达的作家。他讲述的是他从童年到成年成长过程中在特立尼达西班牙港贫民窟米格尔大街上遇到的人和事。故事为读者刻画了特立尼达众生相,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庸碌之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的理想却因特立尼达文化土壤贫瘠而无法实现,最终成为自己生存环境的牺牲品。只有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个人成功逃离特立尼达,到英国留学。小说对特立尼达社会现实有委婉的指责。

《埃尔维拉的选举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 写的是 1950 年发生在特立尼达一个小村镇选举的事情。小说围绕承包商哈本斯竞选特立尼达立法会委员展开,把特立尼达民主写成一部闹剧。民主制度刚刚在特立尼达实行不久,无论是竞选者还是选民,每个人都只把选举当做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他们不懂民主的涵义,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根本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在这场闹剧中,就连狗和巫术都可以左右选举结果。哈本斯竞选的成功其实是特立尼达民主的失败。大选像一面镜子,把具有流浪汉传统的特立尼达社会的各种丑态照了出来。奈保尔把特立尼达民主失败的根源归于其邪恶的国民性。他认为,在特立尼达,人们自私自利,没有社会和国家观念,道德感沦丧,价值标准单一——金钱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国家是无法建构民主大厦的。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 是奈保尔的代表作,写婆罗门种姓出身的毕司沃斯先生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艰苦奋斗的一生。入赘到图尔西家族的毕司沃斯先生为了生存尊严和获得自由,一个人同一个家族对抗。毕司沃斯先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摆脱对图尔西

① Adrian Rowe-Evans, “V. S. Naipaul: A Transition Review,” in *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ed. Feroza Jussawalla.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 25.

家族的依赖,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当他终于拥有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后不久,便心脏病发作而死。毕司沃斯先生是奈保尔用心建构的一个现代人形象。他为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和面对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而表现出的勇敢精神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往往缺乏的。

印度是奈保尔祖先的国度。作为印度移民的后裔,奈保尔对印度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从童年时代起,他对印度就充满了想象。在他的记忆中,印度是在特立尼达家中祖辈流传下来的破旧家什。由于祖辈不大讲述印度,印度在他的想象中是模糊的,是一片“幽黯国度”。然而,印象越是模糊,他的探索欲望就越强,就越想把想象中的返乡变成现实中的旅行。从1962年起至今,奈保尔多次去印度旅行,做文化考察,并且写就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幽黯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 1964)、《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

《幽黯国度》是奈保尔1962年对印度社会进行为期一年考察的结果,是“印度三部曲”中写得最出色的。它在印度引起的震动也最强烈。在这部游记中,奈保尔自报家丑,把印度人随地排便的陋习都抖搂出来。当然,他最主要的是探究印度贫穷的根源。他认为,印度的贫穷源于种姓制度,而不是英国的殖民。种姓制度把人固定在他所属的阶层和所起的作用上,使他没有自我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因而,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同时,他还指出,种姓制度造就了印度民族的劣根性。这部游记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奈保尔在批判印度贫穷的时候,把自己作为返乡游子对印度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和因受欧洲文化影响对印度的鄙薄之情真实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让读者看到了自我分裂的奈保尔。其实,这部书也是在写他自己。

印度拥有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文明。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谈到中国变法的必要性时曾经以印度为例:“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蕃矣。”^①1975年6月,英·甘地夫人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奈保尔闻讯后立即赴印度考察,并且写出一系列关于印度文明已经成为印度现代化羁绊的文章,陆续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最后,奈保尔把这些论文集结成论文集《印度:受伤的文明》。与《黑暗的

^①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见《中华百年经典散文·精神家园卷》,张胜友、蒋和欣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不同,这本书是对造成印度贫穷落后根源的印度文明进行理性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隐退。奈保尔认为,古老的印度文明已经不适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印度,它无法为印度的现代化提供体制性的东西,因此,印度要想发展,就必须抛弃这一过时的文明。

1990年,“印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发表。这部游记仿佛一部口述史,记录了来自印度不同种姓、阶级、性别和族群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对抗和印度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奈保尔对发生在印度的“百万叛变”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印度发展和复原的起点。同时,他也认为,“叛变”是几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埋下的西方文明种子今天终于在印度大地开花结果。他对印度的未来充满期待。

非洲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也不止一次留下了奈保尔的足迹。1966年,奈保尔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任驻校作家。在写作之余,他开始对非洲进行考察。此时的非洲,有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者获得民族独立,正满怀信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们坚信,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非洲时代。甚至欧美的一些媒体也对非洲进行正面报道。但是,奈保尔对非洲的看法是极其悲观的。他认为,非洲就是一片丛林,非洲没有未来。这一观点在他的1971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的同名中篇小说和代表作《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中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不仅如此,几十年来,奈保尔对非洲的这一看法一直没有改变。2008年,将近八十高龄的奈保尔再赴非洲,走访了乌干达、尼日利亚、加纳、加蓬、科特迪瓦和南非等六个国家,考察非洲文明,并且写出游记《非洲的假面剧》(*The Masque of Africa*, 2010)。在这本书中,他由于对非洲国家仍然把持先前既成的观点而饱受诟病。

《在自由的国度》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前言、尾声、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其中,前言和尾声并非虚构,是奈保尔非洲之行的日志;中篇同名小说写一个英国自由主义者鲍比在一个正在发生内战的非洲国家两天两夜旅行时的遭遇。一个关于自由的主题把这几个部分串联到一起。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试图表明,自由往往是个悖论。摆脱了奴役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自由;对不懂得自由这一概念含义的非洲国家和人民来说,自由是无意义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他们往往会因为欲望、自我膨胀和滥用自由而成为自由的囚徒。自由也并非总是意味着解放,它还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河湾》通过一个非洲中部国家一个河湾小镇的兴衰写非洲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情况。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如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把经济现代化当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忽视人的现代化、搞“大跃进”求“速成”等,甚至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玻璃水泥建筑和形象工程。最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失败,又走向传统的老路。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明确地提出了“非洲是一片丛林”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在非洲只是昙花一现,非洲人的国民性和他们骨子里对传统宗教和迷信的依恋决定了非洲国家永远会走“传统”的老路,非洲没有未来。

《非洲的假面剧》是一部考察非洲原始文化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游记。奈保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非洲人信仰的本质”^①。此番非洲六国之旅,所到之处,他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视而不见,他那X光般犀利的眼睛盯着的却是垃圾和丛林。无论是在象征文明的马凯雷雷大学,还是在亚穆苏克罗和平圣母大教堂,都是如此。甚至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都可以使他想到了非洲的丛林。不管在哪里,他都能看到“非洲又做回了自己”^②。从始至终,他都在不厌其烦地用宗教题材进一步证明自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表述的对非洲的观点,即“非洲是一片丛林”^③，“非洲没有未来”^④。他认为,非洲的宗教和现代非洲格格不入,它使非洲回到了丛林状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经济使阿拉伯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惹人注目,伊斯兰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奈保尔对伊斯兰教并不陌生。在特立尼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对穆斯林怀有敌意,认为穆斯林不讲诚信、不可靠。他早期和中期的小说不乏对穆斯林的关怀,其中勾勒的穆斯林形象和东方学家笔下的穆斯林相差无几。

1979年,伊朗爆发了“人质危机”。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劫持了五十多名美国人质。奈保尔闻讯后立即前往,并且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旅行。他走访了伊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并且写出了《在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 1981)。这部游记使他在美国一举成为新闻人物。在这本书中,他把几乎是“东方的”穆斯林这一信息传递给美国和西方读者。

《在信徒的国度》主要是奈保尔对伊斯兰复兴的考察。在他所考察的

① V. S. Naipaul, *The Masque of Africa*. New York: Knopf, 2010, p. 3.

② Ibid., p. 154.

③ Bharati Mukherjee and Robert Boyers, “A Conversation with V. S. Naipaul,” in *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ed. Feroza Jussawalla.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 77.

④ Elizabeth Hardwick, “Meeting V. S. Naipaul,” in *Conversations with Naipaul*, ed. Feroza Jussawalla.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 49.